

医学学术會議資料

傳染性肝炎

苏联医学科学院伊万諾夫斯基病毒研究所
第十五屆學術會議報告摘要

中国医学科学院科学情报研究室

1964

前　　言

本文是根据苏联病毒研究所第十五屆学术會議的报告提綱譯寫的。會議上發表的論文報告共 74 篇，其中包括：病原學 15 篇、流行病學 11 篇、臨床 11 篇、发病機制 17 篇、診斷 15 篇及預防 5 篇。內容涉及到：(1)肝炎病毒的分離、鑑定、混合感染和病原學診斷問題；(2)流行特征和規律，流行病學調查材料的分析和有關傳染途徑問題的討論；(3)臨床特點，孕婦、中年人和兒童感染時的特殊問題，肝硬化的分析以及激素治療和飲食療法問題；(4)发病機制的探討，活體組織形态學、生化學的檢查結果以及酶活性的改變和臨床材料的比較分析，C-反應性蛋白的檢查和自身致敏作用問題；(5)各種診斷方法的評價；(6)使用丙種球蛋白進行預防的方法和效果問題等。在這 74 篇文章中，內容和水平很不一致，有的質量較好，有的較差，也有些報告提綱的文字過於簡短，沒有具體內容，個別也有內容與主題不完全吻合者。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力求按照各篇作者的原意，引述其中的主要材料和基本論點，以求對本屆會議上所提出的報告材料有客觀地了解。

至于各篇報告中所提出的問題，尚有未能得到最後証實或尚有爭論，對這些問題僅供我們批判地思考，或能對我們的工作提供一些新的研究線索。

在本文譯寫過程中，除受原文內容限制外，同時也限于水平，而且時間仓促，譯文中的缺点和錯誤在所難免，凡屬於這方面的缺点和錯誤應由譯者負責。

譯　者

目 录

(一) 実驗研究部分 (病原学部分)	1
(二) 流行病学	4
(三) 臨床	6
(四) 発病机制	8
(五) 診断	11
(六) 預防	13

传染性肝炎

病原学、流行病学、临床、发病机制、诊断、预防

——苏联医学科学院伊万諾夫斯基病毒研究所 1962 年第十五届学术会议报告摘要——

蒋 学 圣 譯

(一) 实驗研究部分(病原学部分)

B. A. Ананьев 和 A. K. Шубладзе 等氏(莫斯科)从141份急性肝炎病人的粪便和血液样品中分离出28株病毒，这些病毒具有下列特点：

对人胚肾細胞选择性敏感，細胞致病作用具有特殊性，与已知病毒的生物学性状和抗原性不同，对外环境作用的抵抗力大。28株病毒的抗原性大部分相同，只有3株彼此不同，并与绝大部分的已知病毒株不同。对病毒培养物进行显微鏡学检查时，在細胞浆和細胞核中均未能发现任何包涵体。用酚提取法成功地得到了病毒的传染性核酸，并經証实为脱氧核糖核酸(DNA)。据細胞致病作用和空斑形成检查結果，測得 50% 的細胞致病量等于 2—3 个空斑形成单位。病毒大小約为 20—60 毫微米，在形态学上与 ECHO 病毒 7 型、流感病毒 A₂、牛痘病毒、腺病毒 4 型等均有区别。恢复期病人的血清学检查結果，查到特异性抗体的阳性率为 70%，但效价不高。若在病毒中加入 1:2000—1:3000 福尔馬林于 37°C 溫度中孵育 5 天，能使病毒灭活，可用以制备診斷和預防方面的制品。

H. И. Ушеренко(奥得薩)利用白陶土吸附方法預先将病毒材料加以浓缩，然后感染鸡胚尿囊腔和绒毛膜，从病人血液中分离到 7 株病毒。用上述方法，有的病毒能传到 51 代。将感染病毒的鸡胚尿液加热 100°C 灭活，能使急性期肝炎病人出現阳性的皮肤反应。鸡胚培养物和肝炎病人恢复期血清的补体結合反应也出現阳性，而和流感、腺病毒、脊髓灰白质炎的特异性血清呈阴性反应。

M. Д. Аленик, 等(高爾基)用人胚肾細胞从病人血液中分离到 5 株病毒，从粪便中分离到 6 株，人胚肾細胞中出現細胞致病作用始于第 2—3 代，病毒滴度不超过 10^{-3} — 10^{-4} 。用人成纖維細胞、HeLa、Detroit-6、Hep-1、Соп、猪腎細胞检查时，于传代过程中，毒株能适应于 Detroit-6 和猪腎細胞，但滴度仅为 10^{-1} — 10^{-2} 。

Д. Х. Фомин 等(烏日哥罗德)用肝炎病人胃内容物和抗血清(肝炎病人、恢复期病人、輸血者、孕妇、内科病人等的血清)做琼脂沉淀反应检查病毒抗原，发现从胃内容物中检出沉淀原的频率很高，且具有特异性。作者将反应阳性的胃内容物感染鸡胚和組織培养，从20分样品中分离到許多株病毒，其中 6 株传到第 8—12 代。病毒在 Detroit-6 細胞中出現明显的細胞致病作用，滴度高达 10^{-6} — 10^{-8} 。

K. Керимзаде(巴庫)应用 HeLa 細胞从 50 份急性期病人的粪便中分离出 24 株病毒，作者并用这些病毒感染 HeLa、Hep-2、Соп、猴腎上皮細胞、人胚腎上皮細胞和人胚肌皮細胞，检查了組織培养中的細胞学和組織化学的改变。发现在組織培养的細胞中有內核包涵体形成，这种包涵体在猴腎上皮細胞、HeLa 和 Hep-2 細胞中易于觀察到。应用病毒細胞致病

作用的交叉中和反应查明：24株中有23株型别相同。其细胞致病性和腺病毒相似，与腺病毒I、IV型的型特异性免疫血清的中和反应也得到阳性结果。作者认为，在巴库肝炎流行期间，从病人所分离出的毒株是属于腺病毒群，这些病毒或者是与肝炎病毒在抗原性上有联系，或者是这些病毒本身参与了肝炎的发病机制。

Н. Б. Прокурякови (基辅) 报告了利用小白鼠实验研究的结果。在部分实验中使用可的松或强的松龙降低小白鼠的抵抗力，感染途径为腹腔注入，肝内注入和食入。结果在105份病人血液和粪便样品中有58份(55.8%)引起感染鼠器官中抗原增聚。

А. К. Шубладзе 和 В. А. Ананьев (1962) 提出利用琼脂扩散沉淀反应诊断传染性肝炎的方法，在许多实验室中得到了应用。这种反应是用来检查疾病初期血清中的沉淀抗原和恢复期的抗体的。多数作者认为本反应对肝炎的早期诊断有一定意义。

Д. Х. Фомин (乌日哥罗德) 应用琼脂沉淀反应检查病人胃内容物、唾液、血清、全血、粪便、尿、阴道分泌物等材料。胃内容物的阳性率为 $79.0\% \pm 3.7$ ，肝炎病人胃内容物和对照血清(输血者、痢疾及其他内科病人的血清)的阳性反应(假阳性)为 $27.6\% \pm 5.1$ 。血清中出现沉淀原的频率与采血时间有关。用全血做实验时，常常出现非特异性反应。唾液和尿中的检查结果不规律，而阴道分泌物中未查出抗原。

Л. В. Стрижко (德涅伯罗彼得罗夫斯克) 应用琼脂沉淀反应追溯诊断肝炎疫区的非典型无黄疸型病人和接触者，结果在14%的受检者中发现有特异性抗体，有7.3%查到抗原。

奥德萨梅奇尼可夫流行病学微生物学研究所提出利用补体结合反应的特异性血清学诊断方法，规定用0.25—0.5%的人造浮石(钠-铝硅酸盐)吸附病毒，预先使病毒抗原浓缩，可提高阳性率。Я. К. Гиммельфарб (奥德萨) 用此法检查病人血清、粪便和胆汁，所获材料说明，此法对于检查急性期病人血液中的病毒抗原较为敏感，一次检查的阳性率达69—70%，多次检查得到的阳性率更高些。受检标本中以胆汁检查所得到的阳性率最高。健康人和对照组病人的非特异性反应阳性率为7—15%，此种情况可能与隐性感染有关。

Баринский И. Ф. (莫斯科) 研究了肝炎的各种血清学反应。他指出：沉淀反应对肝炎早期诊断有一定意义。细胞致病作用的中和反应中的阳性血清出现较晚，往往在恢复远期出现，始于第四个月或以后，且血清效价不高，输血者和其他急性传染病病人的血清中出现中和抗体的百分率也很高，但低于肝炎。作者用大量的病人血清，与狗传染性肝炎病毒、腺病毒、森林脑炎病毒抗原做补体结合和琼脂沉淀反应，查明肝炎病毒不具有与上述病毒的共同抗原。而用肝炎病人血清和动物免疫血清做补体结合、琼脂沉淀的交叉试验时，证实狗肝炎病毒和腺病毒之间有共同抗原。作者强调指出，这种共同抗原是用补体结合反应和琼脂沉淀反应查清的，而不是细胞致病作用的中和反应。至于血凝反应，则只适用于发病初期。作者认为鸡红血球和肝炎病人血清的凝集反应不是由病毒发生的，而是与急性期病人血清蛋白成分的改变有关。

除上述血清学反应外，在诊断病毒性疾病时，结膜反应也得到了成功的应用。结膜反应是一种生物学试验，当家兔眼结膜与病毒或毒素接触时，能产生明显的炎症反应，表现为纤维素性的虹膜炎。加入含有特异性抗体的血清时，可以制止虹膜的出现。根据这种特异性中和反应的原理，结膜反应目前已成功地用于诊断流感、脊髓灰质炎、可赛奇病毒、腺病毒以及其他病毒所引起的疾病。

С. Н. Ручковский (基辅) 曾用肝炎病人血清感染家兔眼前房，得到了阳性的结膜反应，并且敏感性很高。用免疫血清中和结膜反应，也具有严格的特异性。作者应用此反应检

查組織培养中的病毒，在第三—四代培养物中可以得到阳性的結果。60°C加热2小时，不能破坏这种引起阳性結膜反应的成分，延长到3小时則可以使之灭活。用肝炎肝硬化死者的肝組織悬液做結膜反应，也得到了阳性的結果。作者指出，結膜反应不仅可用于检查急性期病人血清，而且也可以检查慢性和迁延型，并可用于診斷不显性、无黃疸型肝炎，甚至可用于检查肝炎疫区的接触者。作者应用不同批号的丙种球蛋白中和結膜反应，查明各不同批号丙种球蛋白中和肝炎病人血清的能力表現不同，指出在应用球蛋白做預防时，应預先检查它的中和能力。

目前形成传染性肝炎的實驗模型仍不可能，因此通过对动物病毒性肝炎的病理形态学的比較研究，可以查清病毒性肝炎所固有的某些共同規律，來說明人的传染性肝炎发病机制中某些不清楚的問題，这是很有意义的。Б. К. Безпрозванный 等（莫斯科）为此目的曾做了一些觀察研究，結果說明：整个机体都参与了传染过程，首先是血液、网織內皮系統、肝脏和中枢神經系統。在形态学上首先可查知的改变是在血液中能够发现病毒性顆粒。随后是网織內皮系統的损伤，以及血管內皮和相应器官网状細胞的进行性病变和退行性（漸进性）細胞坏死，而肝实质的损伤发展較晚，且往往是由中枢神經系統的损伤所促成的。Б. К. Безпрозванный 在另一篇报告中专门談到关于在血液中发现病毒性顆粒的研究結果，指出在患包特金肝炎或动物狗肝炎时，在人或动物体内紅血球的基质中（紅血球表面和血浆中），均有类似的病毒性顆粒存在，这些病毒顆粒在结构上是很特殊的。肝炎病人血液中这些顆粒的数量，随着病程发展而有一定的規律性的变化。健康人和非病毒性黃疸患者的血液中沒有这些顆粒。作者根据所获資料认为，这种血液形态学的检查方法，有可能被用于早期診断。

病毒在肝硬化发生中的作用問題，目前尚有爭論。許多学者认为，肝硬化的發展可能与病毒的繼續活动有关。但是病毒参与肝炎发生肝硬化的归轉，未得到最終証实。Д. Б. Голубев 等（列宁格勒）用肝硬化病人的小块肝和脾感染鸡胚和組織培养，然后与鸡、大鼠和猴的紅血球做血凝反应，試圖寻求应用病毒血清学方法研究此問題的途径。結果提出了一套方法，查明在肝硬化組織感染的鸡胚尿液中有規律地出現血凝活性。当将尿囊液保存时，血凝活性消失，作者并找到了能长期保存鸡胚尿液血凝活性的方法。

各国学者研究肝炎的病因学大多数是沿着分离病毒（特异性病原体）的方向进行工作的。Е. А. Маркова（莫斯科）根据所获材料，认为肝炎的病因不仅是由一种特异性的病原体所决定，而且可能和机体中一般微生物丛的参与有关。病毒性疾病能引起机体的免疫-生物学反应显著減低，因此可以使致病性微生物丛活动起来，此外，在肝炎的病理过程中所发生的胆道运动障碍而形成的胆汁滞留、胆汁化学作用的改变、肝脏抗毒功能的減低等因素，也可能促使微生物丛积极活动。有关的文献材料說明，混合感染在动物實驗性病毒肝炎的发病机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譬如狗肝炎只是当有其他混合感染时，尤其是鏈球菌的混合感染时才能发生。Е. А. Маркова 检查了772人（肝炎319人，其他传染病263人，可疑接触者40人，輸血者150人）的鏈球菌血培养，結果肝炎病人的阳性率为42%，其他传染病病人（伤寒、斑疹伤寒、痢疾）为3%，輸血者为1.3%，接触者40名中有5名阳性，并发现鏈球菌的分离結果与传染过程的时间和严重程度有关。鏈球菌血培养阳性者病程較长，恢复健康的时间迁延，肝脾症候群出現頻率較高，且持續時間較久。例如有17名病人曾分离到鏈球菌血培养2—3次以上，这些病人的病程迁延到三个多月，且带有起伏性，肝大小和肝功能未完全恢复正常。作者和 О. И. Воронкова 等氏又用滴定“0”抗鏈球菌溶血素的滴度做为活动性鏈球菌感染的指征，查明肝炎病人滴度高达76%，对照組为13%。肝炎病人的滴度以在病程

第5—6周最高，以后开始下降，但有 $\frac{1}{3}$ 病例到出院时仍未完全恢复正常。此外，从8例死于肝炎的尸体解剖材料接种之中，全部脏器均为阳性，而其他死者尸体49例中只有4例阳性。作者认为，溶血性链球菌不是肝炎发病的原因，但它在肝炎病人血液中出现会使病程迁延和加重，可能是促使疾病转变成慢性型的原因之一。因为肝炎和并发链球菌感染有联系，故使用抗菌素消除炎症是一合理的治疗方法。

(二) 流 行 病 学

传染性肝炎的流行病学問題，仍然相当复杂，学者們評論本問題的意見很不一致。原因并不在于本病流行病学規律的客觀特征方面，而是由于研究和分析发病率的方法和手段欠完善之故。首先对于那些易于和肝炎相混淆的疾病缺乏确切的鑑別，并且也沒有分別地进行統計學計算。

E. A. Пакторис (莫斯科) 根据流行病学分析指出，成人和儿童肝炎的流行过程有着明显的独立性(季节性不相关，疫区不在一起等等)。这說明存在着两个独立的疾病分类学单位——甲型肝炎和乙型肝炎。作者认为，甲型肝炎具有飞沫传染病所特有的流行病学特点(年龄分布、周期性、流行暴发的扩张性)。甲型肝炎发病率的主要控制因素是人群免疫力的水平，因此，在高度易感的儿童集体机构或是本病长时期不存在或很少发生的地区里，发病率指标达到最大高度。如果考虑到有一大部分的发病經過是无黃疸型的，那么事实上大部分居民在幼年时期就已經患病。在成人中間，甲型肝炎主要常見于农村或与周围隔絕的地方。

作者认为甲型肝炎的腸道传染也不應該否定，但是沒有根据来推論，說是腸道途径决定了本病的基本流行規律，或者說它是高水平发病率的决定条件。

目前成人中間肝炎传播的主要途径是腸胃道外传播。据作者材料，接種性肝炎的比重不低于本病总发病率的40%。作者主张，只有排除腸胃道外途径感染的可能性以后，才可能来研究乙型肝炎的其他传播机轉。

支持甲型肝炎飞沫传染的，有下列一些流行病学觀察材料：

X. Я. Крек (莫斯科) 研究了爱沙尼亚学生中間肝炎的发病率，于1961年觀察到的4次暴发均发生在許多年来沒有一例肝炎发病的农村学校中，并且这些学校周围居民的发病率也很低。暴发是由潜伏期患者到学校后引起的，4个学校的发病率相应为：33%，59.3%，21.8%和17.6%。但在經常发生肝炎的城市，就沒有这种傾向，如在塔尔土市內发病率最高的4个学校仅为4.5%，3.1%，2.3% 和1.9%，塔林市內的4个学校仅为1.5%，0.9%，0.7% 和0.7%。

M. M. Шейнбергас 等(莫斯科，維爾紐斯)調查了立陶宛北部三个地区于1959年秋季发生的肝炎暴发，这次流行主要发生在学校，学生占发病者的半数。在該学年的前四个月(9—12月)，113个学校中有81个学校发生了肝炎。翌年，該地区肝炎发病率极低，这說明是由于易感人群减少之故。作者根据这次流行的特点(传播迅速、广泛性、疫区和受染居民点数量連續不断地增加)，生活和社会条件分析，以及临床材料的特征等，认为主要传播机轉是空气飞沫。

支持腸道外感染的流行病学材料有以下一些：

Ю. М. Роголь 和 E. A. Пакторис (莫斯科) 曾研究了201名成年肝炎病人在本次发病前的3周到6个月内所受到的腸胃道外的手术性质和数量，另有407名病人做为对照。为了避免季节因素的影响，工作是在全年过程中均匀进行的。研究对象中不包括14岁以下的

儿童和孕妇。所获材料証明，肝炎病人既往史中的手术率为 85.1%，对照組为 49.9%，相差 35.2%，但肝炎病人施行手术的范围极广泛，每一手术均大大超过实验組。按手术性质的重要意义排列順序如下：注射、口腔手术、妇科手术、預防接种、輸血等。肝炎病人不仅在既往史中施行手术的頻率高，而且平均每一病人施行手术的次数也比对照組高得多，这說明实际差数高于 35.2%。

Л. Ф. Шевченко 等（基辅）調查了乌克兰切尔尼哥夫州两个村落中肝炎的暴发。該地于 1961 年二个月过程中发生肝炎 58 例，超过往年該地的总发病率，其中 48 名为学生，7 名学龄前儿童，3 名成人。病人先是在学校的低年級出現，間隔 4—17—35 天后在全校各年級均有发生。作者調查暴发的原因是由于在暴发开始的前三个半月时，村里有一名婴儿和一个一年級的小学生得了肝炎，在第一名病例登記之后經過 2 个月，农村中对 1—2 年級学生和 1954—1955 年生的学龄前儿童进行了抗百日咳、天花的預防接种，而在出現第二个肝炎病例以后又經過一个月，曾又对 4—5—6 年級的学生注射BCЖ 疫苗。作者根据这种情况认为，只要有一例肝炎发生的地方，該地应在 6 个月以內禁止进行大规模人群的預防接种。

Г. С. Вашенко 等（德涅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分析了該市某一儿童机构中肝炎的暴发，在 14 例临床和实验室确诊的病例中，有 11 例在发病前受到預防接种，且发病时间与潜伏期相符合。

支持接触传染的流行病学观察，有下列一些材料：

В. Д. Соболева（莫斯科）研究了接触者在肝炎传播中的流行病学意义。分析了 1,593 人分的病案卡，这些人分別居住在 118 个寓所和 8 个临时住所里，其中 96 个寓所和 7 个临时住所中的 1,340 人是接触者，在半年过程中有 545 人发病就医，占 40.7%；对照組为 22 个寓所和 1 个临时住所的 262 份病案卡，半年中有 39 人，占 14.88%。

Э. В. Мачавариани（第比利斯）研究了格魯吉亚地区肝炎的流行特性，据公布材料，該地 1954—1958 年发病率很高，1959 和 1958 相比降低到 43.7%，到 1960 年 11 月又呈增加。城市平均发病率（16.0）高于农村（7.0），全年均有发病記載而在秋冬季有明显的季节性高峰，主要是由 0—14 岁儿童发病人数增加所致。肝炎的季节性高峰与白喉、猩紅热相符合，比腸伤寒晚 3 个月，比痢疾晚 4 个月，作者认为这应以肝炎的潜伏期长来做解释。作者并觀察了东部格魯吉亚农村中 1957—58 两年的暴发流行，在 9,107 名居民中，发病 886 人（9.8%）。两次暴发都是突然开始，流行經過起伏，主要感染成人。家庭內接触者占 13.6—18.9%，接触者发病占 83.2—83.8%，在初起发病的第 19—40 天。

А. И. Левич 等（彼尔姆）調查了彼尔姆肝炎的发病率，指出該地近年来（1957—1961）发病人数一直很高，并且表現有起伏性、季节性，在城市中的各个不同地区間有独立性。1961 年学龄前儿童占优势，集体儿童的发病率相当于散居儿童的 3.4 倍，学生中間的相应指数为 51.5，成人中間为 13.4。

作者认为，虽然腸道外途径感染的比重正在增加，但在传播中起主要作用的仍然是由于相当大一部分病人未能早期发现和住院隔离。在其所觀察的 3,375 名病人中，約有 45% 是在发病 10 天以后住院的，在出現黃疸的第 1—3 天住院的只有 55%。至于診斷不完全，尤其是发病早期、无黃疸和不典型病人的遺漏就更不待言了。

近年来有很大一部分病人（47%）是輕型或不典型肝炎，重型病人的比重降低，迁延型多見于中年以上的人。根据在近十多年中患过肝炎的病人 450 例进行系統觀察的結果，查明其中恢复健康的人数約占 48%，发展为慢性肝炎的为 25.9%，胆道不同程度损伤的有 21.9%，

肝硬化 4.2%，复发 12.6%。

B. П. Сиденко (奥德薩) 試圖說明外环境因素对肝炎发病增高的影响而利用补体結合反应检查了病人周围物体的病毒抗原。共检查取自 221 名病人的手、內衣、床单的洗液1,682份，結果手洗液的阳性率为 31.3%，內衣 36.6%；而取自 126 名其他病人（对照）的478份洗液中，阳性率仅为 2.4%。当灭菌制度紊乱时，医疗器械的检查也会得到阳性結果。检查肝炎病房中用过的注射器和針头，結果在其洗液中和使用該注射器相应的病人血清中均得到阳性結果。医疗器械經 30 分钟煮沸处理后，洗液的补体結合反应变为阴性。

Я. К. Гиммельфарб 等（奥德薩）认为由于多种方式的传播机制，造成了多种形式的带毒現象。按照病毒在机体的部位，有血液带毒和腸道带毒；按照传染过程的状态有潜伏带毒、病人带毒、恢复期带毒、既往患者带毒、接触者带毒——即健康带毒。带毒者在传播肝炎中的流行病学意义无庸贅述。因此作者指出，降低发病率首先要消除带毒現象。

(三) 临 床

И. В. Шахгильдян(莫斯科) 对儿童各型肝炎的临床特性做了比較研究，共觀察无黃疸型患儿 106 名，不典型 122 名，黃胆型 130 名，并相应地对其中的 76, 66, 88 名儿童做了追踪觀察。根据临床症状和体征出現的頻率，列表归纳如下：

	无 黃 瘁 型	不 典 型	黃 瘁 型
食欲减低	76.4%	82.8	89.2
呕 吐	30.2	50.8	57.7
腹 痛	26.4	35.2	39.2
恶 心	13.3	22.1	25.4
萎靡不振、易于疲劳、对玩 具兴趣减低	71.7	75.4	88.5
体温增高	35.8	44.3	53.1
肝 大	各 型	均	有
脾 大	67.0	62.3	59.2
尿顏色改变	64.1	86.9	100
卡他症状	13.2	15.6	16.2
大便失常	12.2	5.7	9.2
肝压痛	4.7	3.3	3.0

此外，心脏方面的改变(心音减低，收縮期杂音)，无黃疸型比黃疸型低 2 倍。

无黃疸型患儿病程經過較輕，临床症状（除肝、脾增大外）平均持續時間比黃疸型低 2—2.5倍，但二者复发和病程恶化出現的頻率相近似，相应为 1.9%，1.5% 和 3.8%，3.8%。

Е. Л. Назаретян (莫斯科) 为查明包特金氏肝炎和其他病毒性肝炎的临床区别，观察了 650 名診断为包特金氏肝炎的病人，发现其中約有 150 名可能是狗传染性肝炎病毒引起的，另 50 名病人患的是疱疹性肝炎，其他 450 名为包特金肝炎，个别病例尚有混合型。前两者临床經過較輕。狗肝炎病毒引起的疾病有明显的胃腸道功能障碍，常誤診为腸伤寒、痢疾、腸炎；疱疹性肝炎时出現灼痛和內分泌系統的功能障碍，常誤診为胆囊结石、胆囊炎、肝胆囊炎、胆道运动障碍等。

М. Л. Орман (莫斯科) 研究了肝炎病人心脏-血管系統和呼吸系統的功能状态，发现有 75% 的病人动脉压降低，63% 毛細血管扩张，半数病人血流減慢。血液中氧气饱和率降低到 93—85% (3 名病人)。当氧气使用系数降低时，大部分病人基础代謝增加。病人以增加每分钟呼吸的容量来补充氧气需要。作者认为气体交換增高是血液循环功能降低的代偿作用，这种情况可做为使用氧气治疗的指征。

Н. А. Фарбер (莫斯科) 观察了 702 名不同病因肝疾患的孕妇，其中只有患病毒性肝炎的孕妇有肝昏迷发生。孕妇患病毒性肝炎会使病程經過加重，促使肝脏发生急性营养障碍。这可能是由于胎盘蛋白使肝脏发生自体致敏作用和內分泌的严重障碍所致。在許多次肝炎大流行中，往往由于孕妇肝营养障碍，增加了肝炎的死亡率。

М. П. Ландышева (鄂木斯克) 观察了 53 名中年以上的肝炎病人和 102 名 45 岁以下的病人。中年人中間有 12 名病情輕微，4 名严重，24 名中等严重，13 名为迁延性。中年人黃疸前期持續时间較长些，黃疸出現頻率較少，但消退緩慢，說明中年人肝組織中病理过程迟緩，再生過程和炎症消散減慢，故約有 $\frac{1}{4}$ 病人轉为慢性肝炎。

И. Е. Тареева 等(莫斯科) 对 500 名病人做了长期觀察，指明約有 80% 恢复期病人在急性期出院以后遺有后遺症 (肝肿大、高胆紅素血症、血內蛋白含量异常等)，并往往持續很长时间，約有 5 % 轉为慢性。

В. Г. Смагин (列宁格勒) 检查了 460 名肝硬化病人，认为有 332 人 (72.2%) 的肝炎是促使肝硬化的主要原因，并认为最常見肝硬化的原因是由于病程严重迁延和复发所造成的。肝炎病程向慢性过程轉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机体状态，如併发慢性腸炎、肝炎 重复感染、慢性酒精中毒、胆道炎症或寄生虫病、蛋白质和維生素缺乏、瘧疾等，均可造成病毒肝炎的迁延过程。此外，对急性期病人延誤住院時間，治疗不彻底，对肝炎的慢性轉变也有很大意义。

В. В. Веселова (鄂木斯克) 根据卅五年 (1928—1962) 的尸体解剖材料，分析了肝脏中毒性营养障碍問題，发现死于病毒肝炎肝营养障碍的病人，既往史中常常患过其他传染病 (瘧疾、梅毒、化脓过程、猩紅热等)，卫国战争时期則多見于伤員。机体中預先存在的有害因素使病毒肝炎病程严重，这种情况下肝脏发生中毒性营养障碍的归轉可以看做是变应性过强的反应 (副变态反应性)。

А. Ф. Билибин (莫斯科) 报告了肝炎治疗方面的若干基本問題。指出：因本病的发病机制尚未搞清楚，治疗問題不能只限于使用某一种《有效》的制剂，而应当是針對解除中毒，减少机体变态反应性的炎症破坏过程而采取綜合治疗的合理方案。

腎上腺皮质激素的治疗效果往往取决于合理的剂量和疗程，以中等剂量 14—18 日疗程最为合宜。可的松一个疗程剂量 1000—1200 毫克，强的松或强的松龙为 200—400 毫克。使用上述剂量和疗程时，停药后很少看到复发。

应用激素治疗虽然能使一般状况显著好轉，消化不良現象消失，食欲恢复，血液中胆紅素水平很快下降，但不能縮短黃疸期的时间，不能及时防止病程的恶化或迁延，不能防止向慢性型的发展。因此必須对患过肝炎的人进行长期觀察(不少于 2 年)，必要时尚需进行第二个疗程。

М. Е. Семенджева (莫斯科) 指出，从預防觀点来看，防止肝炎病人复发具有重要的意義。他观察了 135 名采用激素治疗的急性和慢性病人，其中有 16 人复发，占 11.1%。

Ф. К. Меньшиков (莫斯科) 报告了急性和慢性肝炎时的飲食疗法。指出过去考慮肝炎

飲食时对于維生素和具有亲脂作用的物质注意不够。

作者根据病理治疗原則，注意到促进肝脏糖元形成功能、阻抑脂肪浸潤、增进代謝調節、肝功能恢复和肝上皮細胞的再生，而提出了一种飲食疗法。基本飲食中含有正常量的全价蛋白（其中包括蛋氨酸、胆硷、甜菜硷）；低量的富有飽和脂肪酸的脂肪；高量的碳水化物、抗坏血酸、烟硷酸、叶酸、泛酸、硫胺、核黃素、吡哆醇、維生素 K 和 B₁₂；足够量的銅、錳、鋅。

(四) 发病机制

E. M. Tapeev (莫斯科) 指出了现阶段研究肝炎的特点和若干迫切問題。病毒学的深入研究加上临床、流行病学的特点，可以把本病划分为一般肝炎（經口感染和腸道外感染）及其他异型的病毒性肝炎。在异型的肝炎之中，有的可以通过实验模型来进行研究。

生化学的研究方法，尤其是研究酶的活性，有助于阐明无症状肝炎的流行病学問題及評价各阶段的肝功能状态。在发病机制的研究中，查明紅血球发生形态学上的改变，証实有恒定的感染血相。进一步研究特异性和非特异性成分在发病机制中的相互关系具有重大的理論和实际意义。

A. Ф. Блюгер (里加) 指出肝炎病理过程的形态学和生化学研究同时进行，在临幊上是非常有益的。它可以解决三个相互联系的任务：(1)闡明发病机制，說明功能性研究方法(生化方法) 的真实意义；(2)确定診斷和进行鑑別診斷；(3)估計預后和評價治疗效果。

肝活体組織形态学研究是奠定肝炎发病机制(組織学发病机制) 正确概念的基础。这方面研究查明：肝細胞糖元缺乏和类脂质浸潤均不能表征肝炎的特性，肝炎的主要形态学表現是蛋白变性，直到肝細胞发生带状坏死和亚大块坏死及基质的浸潤性炎症反应。

生化学的研究結果(測定尿排泄17-酮固醇、11-羥皮質甾族和尿胃蛋白酶) 和某些临床征候共同說明：《垂体-皮質-腎上腺》参与肝炎的发病机制，尤其是当严重病例时，腎上腺皮質功能衰竭。

肝脏的功能障碍和形态学的改变往往不相平行。肝細胞发生明显的形态学改变，可能不伴有功能障碍(生化学上是“隐型”)，而有时发现有明显功能障碍时，肝脏中却找不到与之完全相适应的结构上的改变。

为便于治疗起見，作者建議把肝脏的形态学改变限制在2个型別較为合理：(1)蛋白变性和肝細胞坏死伴有关实质炎性浸潤(病毒性和細菌性、急性、亚急性、慢性肝炎、以及肝炎后或坏死后的肝硬化)；(2)肝細胞脂肪变伴有关基质的复发性的浸潤反应(中毒性、营养不良性和其他脂肪性肝病，以及肝病后的肝硬化)。第一組疾病的治疗以糖皮質激素起主要作用；而第二組主要用性激素，同时在使用腎上腺皮質激素时要非常小心，用小剂量，并需在性激素的絕對“保护”下进行。

Г. А. Синайко (莫斯科) 比較了血清酶活性(1,6二磷酸果糖醛縮酶、谷草轉氨酶、谷丙轉氨酶、磷酸已糖异构酶、硷性磷酸酶) 和临床經過，試圖根据酶活性的检查結果来推測病理过程的强度和严重程度。結果在发病初期到黃疸出現时，血清酶活性增高最显著，病程继续发展直到肝营养障碍时，则只有谷丙、谷草轉氨酶系数增多。使用腎上腺皮質激素治疗时，在用药初期，醛縮酶和谷草轉氨酶活性降低，谷丙轉氨酶則不十分显著。所获結果說明，血清酶活性改变的程度和肝病理过程的强度不相符合，酶活性的增高不能简单地解释为肝細胞坏死和它的酶被冲向血管床，而可能是由更复杂的原因所造成的。

М. Е. Семеняева 等 (莫斯科) 檢查了 50 名病人肝穿刺物和血清中精氨酸酶的活性，同时也測定了胆硷脂酶、醛縮酶和轉氨酶。比較了各種酶改變的特点，對其所獲結果進行了討論。

Т. И. Горбунова (莫斯科) 指出，利用活體組織穿刺的細胞學檢查可以正確地評價各不同病期的病變過程和再生過程之間的比例關係，可以推測各階段的發展方向，客觀地評價治療措施的效果。細胞學檢查方法有助於遷延性肝炎和阻塞性黃疸的鑑別診斷。

И. Д. Мансурова (杜尚別) 指出，用活體組織的微量化學分析方法研究病人肝脏中直接進行的代謝過程在肝炎問題的現階段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作者總結了 190 例各臨床型肝炎病人 369 次肝穿刺的微量化學分析結果，指明本方法對闡明複雜的肝代謝障礙的發病機制很有前途。

Д. Г. Рудой 等 (杜尚別) 分析了 31 名遷延型病人的臨床、活體組織形态學、組織化學的研究材料，試圖探討急性型過渡到慢性型的某些機轉問題。結果表明：遷延型肝炎患者膽汁分泌障礙與重症病例相近似，營養障礙特別明顯。DNA 和 RNA 的含量在急性和慢性肝炎時沒有差別。肝脏的硷性磷酸脂酶的活性一般都很高，但是在由遷延過程直接過渡到慢性肝炎的病例中，增高更明顯。

Т. А. Яцышина 等 (莫斯科) 利用肝穿刺活體組織檢查法，研究了 86 例各臨床型病人的肝脏形态學改變，發現臨床恢復的病人包括肝功能正常者，肝脏仍可有退行性和硬化性的改變，甚至於在病後數月到 1 年用穿刺法仍能發現。因此，沒有臨床症候，不能完全排除肝炎的活動性。黃疸時不能說明是進行性過程，也可能是功能障礙的後果。

Е. Н. Тер-Григорова (莫斯科) 指出：根據急性和亞急性肝壞死的形态學標準而得到的肝壞死發展速度的概念與臨床經過不符合：(1) 亞急性大塊壞死伴有明顯的再生過程和硬化過程，有時是在臨牀上發病最急的病例中見到，這說明疾病已經經過了長期的潛伏。(2) 急性大塊壞死有時是在臨牀上病程相當長的病例中發現，這說明壞死過程發生突然或者是以急速地加劇發展。

肝炎臨床表現的嚴重程度有時不符合於肝形态學的改變：(1) 肝急性能障礙發生死亡轉歸的，可以在與任一階段相符合的肝形态學改變時發生。(2) 肝大塊壞死和亞大塊壞死起伏發展的情況下，也可能產生良性的臨床經過。

З. Д. Шварцман (列寧格勒) 觀測了 40 名不同型別和不同病期的肝炎病人的一昼夜尿膽素尿曲線，得到以下結果：(1) 全部肝炎病人都有肝總功能障礙。(2) 臨床恢復時只有少數病例的尿膽素尿曲線恢復正常。(3) 一昼夜尿膽素尿曲線可反映各病期肝功能障礙的程度。(4) 尿膽素尿曲線和膽紅素血症水平之間不相適應。(5) 肝總功能測定是肝功能障礙最敏感的指標，檢查肝炎病人時，特別是恢復期病人，必須做肝總功能測定。

З. Д. Шварцман (列寧格勒) 用紙層析法測定膽紅素，檢查了肝炎病人 120 名，慢性肝炎肝硬化 40 名，肝炎後復發黃疸 10 名，及 50 名健康人做為正常生理指標的對照。觀察結果和臨床經過及肝功能做了比較。

紙層析法可將膽紅素分做三種成分：膽紅素二尿甘酸化物 (Rf 0.2—0.3)，單尿甘酸化物 (Rf 0.5—0.6) 和游離膽紅素 (Rf 0.6—0.7)。

健康人在色層析譜上僅只有一點點可以看得出來的游離膽紅素的斑點。各型肝炎在發病極期和嚴重時，可觀察到三種成分。病危期過了以後，先是二尿甘酸化物消失，然後是單尿甘酸化物消失，到臨床恢復時只剩下游離膽紅素，數量上正常或稍高。病變惡化時，三種成

分全部出現，病程稳定时則只有一种游离胆紅素。肝炎后复发溶血性黃疸时，出現单尿甘酸化物和游离胆紅素。

X. X. Мансуров (杜尚別) 檢查了 65 名肝炎病人、慢性肝炎和肝硬化 37 人、慢性腸炎 29 人血液中胆硈的含量与肝脂肪浸潤之間的关系。結果有 2/3 肝炎病人在发病前 4 周內肝細胞中沒有类脂。从第 4 周起，在黃疸发展以后发生类脂的沉积。有些重症病人在肝脏形态学上有一定的亞大块坏死，甚至到第 8 周时肝細胞中仍沒有脂肪。第13周以后可見到少量微滴状脂肪变。血液中胆硈的含量在第一周和发病最高峰时升高，以后逐漸趋向正常。

H. N. Елизаров 等(莫斯科) 研究了孕妇患肝炎时的出血症候群，指出孕妇感染病毒性肝炎是分娩大出血的潜在威胁。作者比較了孕妇肝炎患者肝损伤的临床特性、肝功能和凝血系統的某些成分 (proconvertin、凝血活性、纖維蛋白原和纖維蛋白溶解活性) 的检查結果。查明肝炎孕妇和晚期妊娠中毒的孕妇的肝损伤性质和 proconvertin 水平之間有密切联系，同时所有併发出血的全部病例中， proconvertin 降低很多。肝炎孕妇在黃疸期凝血活性降低，黃疸恢复期开始回升；而晚期妊娠中毒时这一指标改变不大；大出血病例 3 例中有 2 例降低。肝炎孕妇的纖維蛋白原降低到 350 毫克以下，尤其是重症病人非常明显，而晚期妊娠中毒时纖維蛋白原的数量一般保持在正常水平。溶纖維蛋白活性往往在較重的肝炎病例中发现，但晚期妊娠中毒时却看不到。根据临床和实验室結果的比較，說明肝炎孕妇出血合併症的原因，是由凝血和抗凝血系統各成分之間的代偿性联系遭受破坏。为了防止肝炎孕妇大出血的危险，应及时进行早期診斷和采用纖維蛋白原靜脉注入的綜合治疗方法。

Д. III. Еналеева (喀山) 研究了肝炎时氧化还原过程的性质和基础代謝。共检查 91 例病人，发现大部分病人基础代謝增高，每分钟氧气吞噬平均为 10—25% (81 例病人)，每分钟的呼吸量也增高到 20—45%。肺活量、呼吸間隙、呼吸儲量、呼吸頻率等均无异常。本組病人未見有心脏血管系統的疾病。因此，每分钟氧气吞噬增高、呼吸容量和与之有关的基础代謝的增高，不可能解释为心血管系統的疾患。机体中氧气不足而发生这些改变的原因，在于和細胞呼吸相关的氧化还原过程遭受破坏。尿氧化不足 (91 例肝炎病人平均指数 1.56—2.09，正常人 1.29) 是由于組織代謝发生障碍，尿中排出氧化不全的代謝产物数量增加，从而使尿氧化不足指数增高。

E. N. Тер-Григорова (莫斯科) 觀察了肝炎时的肝脾症候群，証明脾脏积极地参加到急性传染过程，其特点是重量增加、充血、脾髓网状細胞增生，尤以急性和亚急性肝坏死的死亡归轉时更較明显。无肝硬化的迁延性、慢性肝炎患者均有脾大，并伴随脾机能亢进和門脉压过高。脾大时的外科手术問題应根据肝功能状态的检查結果决定。

B. M. Шубик (列宁格勒) 利用测定 C-反应性蛋白的方法检查了 368 名肝炎病人，查明血液中出現抗正常肝組織的抗体，証明有自身致敏作用存在。C-反应性蛋白是用家兔特异性免疫血清的冷补体結合反应測定的。預備实验中查明此法比一般采用的沉淀反应敏感性高。抗正常肝組織的完全抗体也是用冷补体結合反应測定的，不完全抗体是按 Штейфен 氏法根据抗球蛋白血清效价減低反应測定的。

疾病的极期和病程严重时，血液中 C-反应性蛋白的浓度最大。測定 C-反应性蛋白无疑具有診斷意义，但沒有鑑別診斷价值。肝炎病人血液中有規律地出現抗正常肝組織的完全抗体和不完全抗体。急性肝炎向慢性轉变时，血液中抗正常肝組織的不完全抗体含量增高。

3. A. Бондарь 等 (莫斯科) 研究了肝炎后慢性肝疾患时血清蛋白免疫学性质的改变，結果查明，病人血清中出現大量的与正常血清蛋白的免疫学性质不同的血清蛋白。其数量相

当于血清蛋白总量的15—50%，并查明此种蛋白的数量和肝损伤的严重程度、血清中胆红素和转氨酶的增高有关。使用肾上腺皮质激素治疗时，此种蛋白数量显著降低。

慢性肝疾患病人血清中免疫学改变的蛋白与肾疾患病人血液中出现的抗改变蛋白的血清抗体不起作用。肝疾患时出现此种改变的特异性问题，现正在研究中。

(五) 診 斷

И. В. Шахгильдян (莫斯科) 研究了各种血清酶的診斷价值，共检查 358 例肝炎病儿，220 名其他病儿和 740 名肝炎疫区的正常人。結果各型肝炎病儿血清酶活性阳性診斷率在病初五天为 97%—100%，10—14 天后酶反应的診斷价值显著減低。轉氨酶活性保持增高的時間最长，检查此酶活性做为恢复健康的标准較可靠，并可用做为对本病的追溯診斷。无黃疸型血清酶活性高水平較低，且恢复較快。接触者检查发現在临床症状出現前 2—4 天內轉氨酶及醛縮酶即已增高。其他疾病如蠕虫病、食物中毒、呼吸道卡他、流感、传染性单核細胞增多症等只有少数病例酶活性增高，但不显著。鞭毛虫病和細菌性肝胆囊炎时，往往也增高，但程度較差。

Н. Б. Тагиева (巴庫) 检查了传染病院的 711 名人員的血清酶活性，其中肝炎病人 309 人，恶性肿瘤发生的黃疸 25 人，慢性肝炎和肝胆囊炎 63 人，既往未患过肝炎者 65 人，其他疾病 (布氏菌病、溶血性黃疸、流感、痢疾) 161 人，健康給血者 88 人。根据检查結果，作者以轉氨酶不高于 40 单位和谷草轉氨酶/谷丙轉氨酶的系数不低于 1 作为正常标准。

肝炎时谷丙轉氨酶介于 32—398 单位，平均 178.7。谷草轉氨酶为 44—284 单位，平均 126.6。因此，谷草轉氨酶和谷丙轉氨酶的比例大部分病人均低于 1，一般为 0.3—0.9，平均 0.5。

肿瘤黃疸病人和胆道良性损伤的机械性黃疸病人，轉氨酶活性在正常范围内或稍高，谷草/谷丙的系数一般高于 1，部分病人低于 1。

大部分肝炎病人醛縮酶和轉氨酶活性相适应，有 24% 病例轉氨酶很高 (100 单位以上)，而醛縮酶正常。肝炎时磷酸酶活性正常 (8 单位)，而肿瘤性黃疸病人增高到 16—69 单位 (平均 37.1 单位)。

Г. С. Ващенко 等 (德涅伯罗彼得罗夫斯克) 共检查健康人 75 人，肝炎病人 307 人，其他传染病人 102 人的谷草轉氨酶的活性。认为谷草轉氨酶是一有价值的診斷方法，可以和醛縮酶、胆紅素等一起用于肝炎診斷。

Э. Ф. Зайкова (奥姆斯克) 研究了肝炎病人、其他肝病和健康人血液中的酶譜 (醛縮酶、硷性磷酸酶、谷草轉氨酶、谷丙轉氨酶、磷酸己糖异构酶、奎宁氧化酶、鳥氨酸-氨基基轉換酶)。

結果表明，磷酸己糖异构酶有診斷意义，50 名肝炎病人中有 48 人此酶活性增高，始于发病初期，到第二周达最高度，然后逐渐下降，大部分病例到恢复期尚未正常。磷酸己糖异构酶的活性与疾病的严重程度有关，重症和中等严重病例酶活性增高明显，持续时间较长，只有少数輕症病例在整个病程中保持正常。

奎宁氧化酶的活性在 50 名病人中也有 48 人增高，以第一周最高，从第二周起下降，到临床恢复正常。此酶的活性与疾病的严重程度无关。

鳥氨酸-氨基基轉換酶在 40 名肝炎病人中比正常高 1—4 倍，同时查明，酶活性增高始于病初，到黃疸第一周达最高度，然后下降到正常，比其他酶 (磷酸己糖异构酶、谷草轉氨

酶) 恢复較早。肝炎病人血清中鳥氨酸-氨基基轉換酶的測定是有价值的，实际上这种酶只存在于肝細胞中，只有在肝病时才可能引起它在血清中出現。

Л. Л. Громашевская 等(莫斯科)报导了山梨醇脱氢酶、奎宁氧化酶、脫氧核糖核酸酶对于肝炎和阻塞性黃疸的鑑別診斷意义，并对上述各种酶的活性和沉淀反应試驗結果做了比較分析。

И. С. Присс(莫斯科)提出血清中的蛋白組成成分脂蛋白和糖蛋白的改变可能与肝炎的临床特性有关。因此用电泳法研究了150名病人，包括肝硬化病人的上述化学成分。比較了肝炎和其他肝病时的實驗結果，并做了討論。

III. С. Халфен(巴庫)研究了某些非典型肝炎的診斷問題，据作者觀察結果认为：血凝反应，测定谷草、谷丙轉氨酶的活性，其次是醛縮酶等这些检查方法有助于黃疸前期和潜伏期病人的发现。肝炎重型黃疸和壺腹周围癌肿病人的黃疸的鑑別診斷非常困难，往往延誤癌症病人的手术治疗，因此凡40岁以上的疑似肝炎病人在发病初期即应进行綜合检查。

Б. Л. Угрюмов(基輔)检查了幼儿园、托儿所和家庭中的肝炎病人120名，并对恢复期病人追踪觀察一年，結果无黃疸型占总病例的43.1%。无黃疸型的临床經過在急性期和黃疸型區別不大。因此診斷无黃疸型需依靠流行动态和既往史，正确估价疾病各阶段的临床症状和實驗室检查結果(测定血液胆紅素、轉氨酶、醛縮酶、和胆汁酸等)。

А. В. Змызгова等(莫斯科)研究了肝炎时血浆和血清粘性的診斷意义。因目前所采用的實驗室診斷方法往往需要有專門的設備，并需花費較長的時間，因此有必要寻求一种新的較为简单易行的診斷方法。

作者共检查了254人(健康人10名，肝炎病人145名，阻塞性黃疸48人，肝硬化12人，其他病因黃疸6人，疑似病人27人，其他病人6人)，大部分检查均在发病过程中进行2—6次。結果查明，各型肝炎病人在发病极期血浆粘性降低者占77.1%，血清粘性降低者占71.3%，其他黃疸病人，包括阻塞性黃疸，粘性保持正常或稍高。作者比較了其他肝功能試驗，认为按改变的頻率和診斷意义可以做如下順序的排列：谷草轉氨酶、谷丙轉氨酶、醛縮酶、升汞試驗、血浆粘性、麝香草酚試驗、血清粘性。

Д. Б. Голубев等(列寧格勒)引述了列寧格勒各防治机构使用鸡紅血球凝集反应診斷肝炎的經驗總結，討論了本反应的适宜条件和使用特异性血清、致敏的鸡紅血球的血凝反应法，并和其他的實驗室方法做了比較。

И. К. Рейнанд等(塔林)检查了156例急性肝炎病人血清的血凝反应，結果在发病第一周27名病人中，阳性17人，第二周42名病人中阳性40人，第三周31名病人中阳性24人，第六周以后阳性反应病例約占50%。58名病人的血凝反应动态检查結果是：发病初期效价上升，而后有些病人立即下降，另一些病人仍保持高效价，到8周以后才降到正常。

37名疑似病人中，22人血凝反应阴性，其中7人后来診斷为流感、結腸炎、慢性腸炎者血凝反应为弱阳性，8人診斷为急性痢疾和鞭毛虫性胆囊炎者，血凝反应为强阳性。

血凝反应和血液中胆紅素的含量、血清蛋白的沉淀反应、醛縮酶和轉氨酶的活性等均无平行关系。血凝反应比酶活性升高較早，而在酶活性恢复正常之前血凝效价已降低。本反应与肝炎时机体中抗体的存在无关。

Н. В. Татьянко(基輔)研究了絮状反应对各种病因黃疸的鑑別診斷意义。检查了185份血清，其中肝炎病人血清115份，阻塞性黃疸病人血清46份，其他病人包括溶血性黃疸病人血清14份，同时測定了血液中胆紅素的浓度和血清醛縮酶、轉氨酶的活性。結果在良

性肿瘤的阻塞性黃疸病人中間有規律地出現阳性絮状反应，隨着黃疸的发展和血液中胆紅素的增高，絮状沉淀的浓度加大。胆石病人的阻塞性黃疸一般也是隨黃疸发展而出現阳性反应，到临床症状消失时反应变为阴性。肝炎病人中則有 86.6% 反应阴性。溶血性黃疸和其他病人也是阴性。本反应方法簡單，是非特异性的，无独立診斷意义，但可作为一輔助方法，以早期鑑別阻塞性黃疸。

Е. Ф. Карнаухов 等（莫斯科）研究了自家血清皮內試驗的診斷 意义。共检查 129 名肝炎病人，有 65% 病例出現阳性，阳性反应主要发生在发病初期和极期，并在很大程度上与血清醛縮酶活性的改变相符合，与疾病严重性的关系不明显。另外检查了 11 名无明显肝实质损伤的阻塞性黃疸病人，自家血清皮內反应全部为阴性。

Н. И. Кривая-Ушеренко 等（奧德薩）检查了 370 名肝炎病人的皮肤反应，阳性者占 84.6%；对照組 136 人，阳性反应占 15.5%；后者可能与无黃疸型病人存在有关。阳性反应在病初前 3 周內表現明显，以后逐渐消失，病人出院时往往阴性，迁延病例保持出現阳性反应的时间較长久。

З. А. Комова（高爾基）对目前所采用的几种實驗室方法診斷不典型和无黃疸型儿童肝炎的意义做了比較，觀察了 172 名疑似肝炎病儿，其中 86 人后来診斷为不典型和无黃疸型肝炎，其余病儿未証实肝炎診斷；后組病儿包括肝胆囊炎、胆囊炎、賈第鞭毛虫病、流感、上呼吸道卡他等。对全部病儿做了仔細的临床检查，并測定了血液胆紅素、尿胆素、醛縮酶和轉氨酶的活性、血清鐵含量、麝香草酚試驗。結果，非典型肝炎病儿谷丙轉氨酶活性增高者占 78%，麝香草酚阳性者占 70%，醛縮酶活性增多者占 51%，血清鐵含量增高仅占 35%。后一組病儿醛縮酶高于 20 单位者占 4.6%，谷丙轉氨酶高于 35 单位者占 5.8%，血清鐵含量高于 120% 者占 5.8%，麝香草酚阳性者占 4.6%。

（六）預 防

預防方面的五篇報告全部是关于丙种球蛋白的应用和效果問題。

Е. А. Пакторис（莫斯科）指出，丙种球蛋白所形成的被动免疫只能減輕 症狀，不足以完全保护机体不得病，儿童机构中使用丙种球蛋白以后，无黃疸型的比值增加。

合理使用丙种球蛋白的重要因素是使用時間問題。若按疫区的流行病学指征使用时，效果很不及时，因为发现第一个病例往往是在出現黃疸以后。据作者觀察的 4 个疫区中有 3 个是由无黃疸型肝炎患者帶入的，第一批黃疸病人出現恰是在流行高峰，在这样的疫区里发病率往往决定于第一批病例的数量，因为后一批病人可以使用丙种球蛋白加以防止。根据这一点并考慮到肝炎有显著的季节性，在受威胁的机构中，于流行前期，即在未出現病例以前就注射丙种球蛋白才为合理。

Е. А. Пакторис, Х. Я. Креек, Т. С. Подседловский, С. С. Спотаренко, С. Г. Файерштейн（莫斯科、塔林、維爾紐斯）在爱沙尼亚和立陶宛加盟共和国和莫斯科省大規模觀察了 300,000 人，其中半数是对照。丙种球蛋白的注射时间为：1960 年 9 月（立陶宛），1961 年 9—10 月（立陶宛和爱沙尼亚），1962 年 5 月（莫斯科省）。注射剂量为 1—2 毫升（爱沙尼亚）和 1.5—3 毫升（立陶宛和莫斯科省），一次注射給机构中的全体人員或半數人員。此外在有些省市內的集体机构中只按流行指征使用。

結果証明，流行季节前期使用时預防效果很高，并保持 6—7 个月不变，实际上注射过的兒童的发病率全年都很稳定。此期內每月发病的指數：實驗組每 10,000 学生中为 0.5—

1.6，对照組为2.5—11.8。有些組是以流行过程的强度来测定指数的，注射后7个月中間的发病指数，实验組为每一万人8.5，对照組为52.9。效果指数为6.2。經過6—7个月后，两組发病率拉平，这并不是由于实验組中发病率增高了，而是因为季节性发病率降低了的缘故。可見为了确知丙种球蛋白預防效果的真正持續時間，还需要繼續觀察。在发病前2周，即潜伏期，注入球蛋白的效果有限，但在給半數人員注射的集体中，同样可以防止肝炎的暴发流行。

X. Я. Креек (莫斯科) 将爱沙尼亚的学校分为3个实验組：第一組将丙种球蛋白注射給全校各年級的半数学員，共31,775人，对照組32,027人（同班学員）。第二組給本区半数学校的全部学員，共25,315人，对照組为本区其他学校学員26,060人。第三組是两个城市中的学校，又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注射給每班学員半数，共7,514人，对照7,520人，第二部分15,436人，仅按法定的流行指征使用。最后一部分16,071人，全未采用球蛋白。注射剂量为2.0(28,534人)和1.0毫升(36,070人)，后者中有14,361人于翌年又重复注射1毫升。

根据实验結果，作者认为在学年开始时(即9月份)給各年級的半数学員注射1.0毫升，发病率降低相当显著。同一学年中重复注射没有必要。高年級学員（在10年制学校中8年級以上者）可以不給丙种球蛋白，因为他們中間的发病率很低。丙种球蛋白首先應該給城市学校的学員注射，在农村中肝炎发病較少，当出現第一例肝炎病人以后再給全校学員注射。这种办法在农村可能是合理的。

T. С. Подеедловский (維爾紐斯) 提出立陶宛使用丙种球蛋白預防肝炎的总结。1960年9月該地区注射5,063名学員，剂量为1.5和3.0，对照觀察5,159人，預先証明效果良好后，于1961—1962学年开始时，在22个地区大規模注射40,164学員，对照觀察34,317人，結果証明在流行前期注射时，效果可保持全学年。

Л. И. Колесникова等 (莫斯科) 最后报告了关于接种丙种球蛋白传播肝炎病毒的安全性問題。指出，禁止采用既往史有黃疸和肝疾患妇人的胎盘血或流产血来制备丙种球蛋白，这种規定是非常正确的。但由于有不典型和无症状肝炎及带毒者存在，仍有可能随一部分血清把病毒帶入到用以制备球蛋白的大量血清混合物中，目前使用的KOH氏低溫酒精分馏法，可以保証获制安全的丙种球蛋白制品。苏联大規模使用球蛋白接种的經驗証明，本法制备的球蛋白安全可靠。